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宋元话本

程毅中 著

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宋元话本

程毅中著

中华书局

1980年·北京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宋元话本

程毅中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3⁵/₈印张·72千字

1980年10月第2版 1982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37,401—62,400册

统一书号: 10018·460 定价: 0.30元

目 录

第一章 说话和话本

- 第一节 说话的渊源..... 1
- 第二节 宋元的说话..... 8
- 第三节 话本的编写和流传.....23

第二章 讲史

- 第一节 讲史的名目、体制和题材.....35
- 第二节 讲史的主题思想.....46
- 第三节 讲史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52

第三章 小说

- 第一节 小说的题材和篇目.....58
- 第二节 小说的体制.....63
- 第三节 小说的思想性.....70
- 第四节 小说的艺术性.....79

第四章 宋元话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第一节 话本的历史意义.....93
- 第二节 话本在小说发展中的作用.....96
- 第三节 话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 102
- 第四节 话本的研究和整理..... 107

- 再版附记..... 112

第一章 说话和话本

第一节 说话的渊源

什么叫做说话？“说话”就是讲故事，相当于现代的说书。古代人把故事称作“话”，这个名词早在隋唐时代就这样运用，见于《太平广记》卷248引《启颜录》：

（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

这里所谓“说一个好话”，就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的意思。侯白是一个善于说笑话的人，当时的官僚大臣就把他当作艺人看待，专门让他讲故事作为娱乐。后来人们就把讲历史故事叫作说古话，把小故事叫作小话^①。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把逗乐的故事叫作笑话。

说话这个名称虽在隋唐以后才流行，可是说故事这件事情却是早就有的。鲁迅先生在谈到小说起源时曾说：

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②

① 参考孙惜第《说话考》，见《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27页。

② 《鲁迅全集》第8卷，《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根据现有的资料，大致可以肯定上古时代就有讲故事的说唱文学了。例如《荀子》里的《成相篇》，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它就是采用当时流行的民间说唱文学体裁写的。从唐代的变文、俗讲一直到现代的弹词、鼓词，都是带有唱词的说书形式。古代的口头文学多半是有说有唱的，而且往往以唱为主。后世才逐渐变为以说为主，甚至只说不唱了。然而直到现代，说书还是作为曲艺中的一种，说和唱几乎是分不开的。单纯的说话可能发展得比较晚。三国时曹植曾在邯郸淳面前背诵“俳优小说”^①。“小说”和“俳优”连在一起，而且用来背诵，可见已经是一种口头演说的文艺形式，和《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小说家有所不同。南朝陈始兴王叔陵是一个喜欢看杂戏的，他曾在深夜里，“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②。这可以说是说话的一种早期形式。真正把说话当作一种文娱活动，那应该是唐代的事情。郭湜《高力士外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太上皇就是唐明皇李隆基。这时候他被儿子肃宗皇帝关禁在冷宫里，非常苦闷，所以高力士就想办法给他解闷。我们知道，讲经和转变都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说唱文艺形式，说话和它们相提并论，当然也是一种同类性质的东西。这时候是上元元年（公元760），说话不但在民间流行，而且也进入宫廷了。

① 《三国志》卷21裴松之注引《魏略》。俳优是古代的戏剧演员，一般都带有滑稽性，近似丑角。

② 《南史》卷65《陈始兴王叔陵传》。“人间”即“民间”，唐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民”字都改为“人”字。

在此以后不久，诗人元稹写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里，有一句说：“光阴听话移。”下面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①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指的是他在前两年和白居易一起玩乐的事，新昌宅就是白居易在长安新昌里的住宅。所谓“一枝花话”就是李娃的故事。李娃是长安有名的妓女，别名一枝花^②。她的故事详见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写的《李娃传》。元稹和白居易在新昌宅所听的“一枝花话”，到底是谁说的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们请艺人到家里来表演^③；另一种可能是白居易自己在家讲这个故事。依我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些。因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各种版本的《元氏长庆集》，都只说是“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而没有说是听别人说话。说话的好象就是他们自己。而且白行简在《李娃传》里又说：“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详谙其事。”似乎当时还只有白家的人才熟悉这个故事。而且，当时文人们确有聚集朋友在一起夜话消遣的风气，有不少传奇文就是在这种风气下产生的。《李娃传》末尾也说到：

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毫，疏而存之。

可见这一回确是白行简自己在讲故事。

① 《元氏长庆集》卷 10。

② 见曾慥《类说》卷 28《异闻集·汧国夫人传》及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 1《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

③ 曾见有人引元稹诗注作“顾复本说一枝花”，但不知根据什么版本。如果可靠的话，那么顾复本可能就是说话人的姓名。但《类说》本《异闻集·汧国夫人传》末有“本说一枝花自演”的话，“自演”即“自寅至巳”的讹文。

不管“一枝花话”是艺人说的也好，还是白居易自己说的也好，元稹诗注里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些情况：在公元九世纪初，说话的风气相当盛行。不仅进入宫廷，如上引《高力士外传》所说，而且也进入了第宅。“一枝花话”是唐代开始流行的一个话本，一直流传到明代未曾失传，至今还保存着两种版本^①。如果它最初是由艺人传播出来的，那么可以说明它的影响很大，不但白居易等人爱听，而且还采用说话的故事写成了传奇；如果它最初是由白居易家里人传播出来的，那么也可以说明文人们曾采用过说话的形式来讲故事，而“一枝花”也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话本。元稹曾说“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可见此话说来很长，自寅至巳就是八个小时，决不会象《李娃传》里所写的那样简单。由此可见，唐代说话的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唐会要》卷四曾载：“元和十年(815)……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民〕间小说。”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篇》里又提到：“予太和(827—835)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这里所说的“民间小说”和“市人小说”，应该属于杂戏中的说话，和宋朝人所说的“市瓦伎艺”相同。而且段成式还说是因为他弟弟过生日才看的杂戏，就象近代的喜庆堂会一样，应该是召请艺人来家里表演作为娱乐的。李商隐的《骄儿诗》里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现在多数研究小说史的专家都认为这就是唐代已经有说三国志故事的证据。现存唐代文献中，还保存着“死诸葛

^① 《醉翁谈录》所载宋代话本名目中有《李亚仙》一本。今存话本《李亚仙记》，有小说传奇合刊本及《燕居笔记》本，象是明代的修改本。

走生仲达”的故事^①，更足以证明三国故事早在民间流传了。贯休的《观怀素草书歌》里还有这样一些句子：

醉来把笔狞如虎，粉壁素屏不问主。乱拿乱抹无规矩，罗刹石上坐伍子胥，剡通八字立对汉高祖。……忽如鄂公喝住单雄信，秦王肩上剮著枣木梨^②。

这些人物形象，很可能也是从民间说话的《春秋列国志》、《汉书》、《隋唐》等故事里采取来的。

唐代曾有说话的杂戏艺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存的话本不多。除了有《李娃传》可以作为一枝花话的节要本来参看之外，还有一个敦煌写本的《鹞山远公话》^③，原题就写明“话”字，显然是话本。此外，敦煌写卷中还有许多说唱文学，也是可以作为话本看待的^④。例如有一本《韩擒虎话本》，原来并没有题目，只是末尾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的话，有人认为这个“画本”就是话本。这是可以相信的。即使它原来的确不叫话本而叫画本，它的性质也和话本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唐代有一种照着图画讲唱故事的文艺形式，叫做变文，它也可以说是说唱文学的话本。那么这篇韩擒虎故事叫作画本，也可能和变文一样，是有画图作为参照的。敦煌变文中有不少是说唱佛经故事的，如《八相变》、《破魔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等；但还有许多是说唱历史故事的，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王昭君变文》、《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虽然说唱变文叫作转变，表示它是以

① 参看《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

② 《禅月集》卷6。

③ 见《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卷2。

④ 以下所引敦煌写卷，都收在《敦煌变文集》里。

唱为主要特点的，和以说为主要特点的说话稍有区别，然而也不妨把它看作一种早期的讲史话本。这里引录《汉将王陵变》开头一段作为例子：

忆昔刘项起义争雄，三尺白刃，博〔拨〕乱中原，东思禹帝，西定强秦。鞍不离马背，甲不离将身。大陈〔阵〕七十二陈，小陈三十三陈，陈陈皆输他西楚霸王。唯有汉高皇帝大殿而坐，诏其张良，附近殿前。张良闻诏，趋至殿前，拜舞礼中〔终〕，叫呼万岁。汉帝谓张良曰：“三军将士，受其楚痛之声。与寡人宣其口敕：号令三军，怨寡人者，任居上殿，摆寡人首，送与西楚霸王。”三军闻语，哽噎悲啼，皆负戈甲，去汉王三十步地远下营去。夜至一更已尽，左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王陵，右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灌婴，二将商量，拟往楚家斫营。张良谓灌婴曰：“凡人斫营，先辞他上命；若不辞他上命，何名为斫营？”二将当时夜半越对，唬得皇帝浹背汗流。汉帝谓二人曰：“朕之无其诏命，何得夜半二人越对？”遂诏二大臣，附近殿前：“莫朕无天分，一任上殿，摆寡人首，送与西楚霸王亦得。”王陵奏曰：“臣缘事主，争敢如然！臣见陛下频战频输，今夜二将拟往〔楚家〕斫营，拟切我王本情。”皇帝闻奏，龙颜大悦，开库赐雕弓两张，宝箭二百隻，分付与二大臣：“事了早回，莫令朕之远忧。”二将辞王，便往斫营处，〔从此〕一铺，便是变初。

此是高皇八九年， 自从每每事王前，
宝剑利拔长离鞘， 雕弓每每换三弦。
陵语大夫今夜出， 楚家军号总须翻，
选拣诸臣去不得， 将军攒甲速攀鞍。
灌婴大夫和曰：

自从挥剑事高皇， 大战曾经数十场，
小阵彭原都无数， 遍体浑身刀箭疮。
不但今夜斫营去， 前头风火亦须汤。
白羽新雕一百双， 龙剑新磨利若霜，
倘若今夜逢项羽， 斩首将来献我王。

除了变文之外，敦煌写卷中还有许多讲历史故事的说唱文学，名称各有不同，体裁也略有差异，但性质是相似的。如《韩朋赋》、《晏子赋》、《前汉刘家太子传》、《唐太宗入冥记》（题目原缺，今人拟加）等。值得注意的还有一本叫做《季布骂阵词文》，又名《捉季布传文》，全篇是七言唱词，讲的是汉高祖捉拿季布的故事，最后两句说：“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可见当时确有说唱《汉书》的词人，他们的话本叫作词文，也就是后世的词话。另外又有一本《季布诗咏》，形式和《季布骂阵词文》相同，但内容却是讲张良唱楚歌散却楚军的故事。现在拟名为《董永变文》的一篇唱词，原来并无题目，从体裁上看也应该是词文。还有《下女夫词》和《苏武李陵执别词》，都是词文的别体。最后还应该提到唐代的俗讲，也就是讲唱经文。它是把佛经改编为说唱体，用来吸引听众，宣传佛教。当时有不少人爱听这种俗讲。据赵璘《因话录》的记载，有一个俗讲法师，名叫文淑，最为听众欢迎，据说“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虽然讲的是佛经故事，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讲唱文，也可以算作说话的一种。宋代的说话人中，就有说经说参请一家。敦煌本《辞道场文》^①里曾说：“讲经直作耶娘相，说话还同父母因。”把说话和讲经连在一起说，显然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和尚既能讲经，还兼能“说话”，大概说佛经故事也可以叫作“说话”。

其实，唐代的话本还是很多的。不过，以前人不大注意，

^① 见许国霖编《敦煌杂录》，原卷为北京图书馆藏，索字46号。

所以发掘得不多，研究得也不够。现存的写卷中还有一些象是属于话本性质的。例如《孝子传》这样的作品，看起来好象是一部传记，可是它的体裁却很特别。其中舜的故事，就写成这样的形式：

舜子者，冀邑人也。早丧慈母，独养老父瞽叟。父取后妻，妻譖其夫，频欲杀舜。令舜濠井，与石压之。孝感于天，潞东家井出。舜奔耕历山。后闻米贵，将来冀都而求。及见后母，就舜买米，舜识是母，密与其钱及米置囊中。如此数度，〔后母〕到家，具说上事。〔瞽〕胰〔叟〕拟〔疑〕是舜，令妻引手，遂往市都，高声唤云：“子之语声，以〔似〕吾舜子。”舜知是父，遂拨人向父亲抱头而哭，与〔以〕舌舐其父眼，其眼得再明。市人见之，无不惊怪。诗曰：

瞽叟填井自目盲， 舜子从来历山耕，
将来冀都逢父母， 以舌舐眼再还明。

又诗云：

孝顺父母感于天， 舜子濠井得银钱。
父母抛石压舜子， 感得穿井东家连。

如果我们把它和另一篇《舜子至孝变文》（即《舜子变》）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一段传文正是变文的缩本，最后两首诗也和《舜子至孝变文》结尾所用的完全一样。而且有诗为证的收尾格式也和后世的话本并无不同。由此可见，唐代的说话已经有多样的形式和大量的作品了。

第二节 宋元的说话

说话这种艺术，到了宋代更为发达。这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的。宋朝统一中国以后，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也逐步地发展到更高的水平，

造成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某些大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小业主等，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城市居民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地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也日益扩大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里曾描写了北宋末年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社会生活情况：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这就是宋代一个短暂时期的太平景象。《东京梦华录》里详细地记载着北宋时期东京城里各种各样的商店，各种各样的商品，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豪华奢侈。每当节日，居民都出来游玩，更有一番热闹。特别是元宵节，由于皇帝要做出与民同乐的样子，还有许多游戏节目。这在话本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描写。至今保存着的《金明池图》和《清明上河图》更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景象。到了南宋，朝廷与金人议和之后，取得一个苟安的局面。由于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非常繁荣。统治阶级过着“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生活，而一部分城市居民也暂时得到了安居乐业的机会。当时的首都临安(今杭州)又出现了铺张浪费的风气，西湖就曾被称作“销金锅儿”。我们不妨看一下话本《钱塘梦》里的叙述：

说不尽杭州好景，有东菜、西水、南柴、北米^①。自古建都之地，

① 这是说杭州四方出产的物资。参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临安四门所出》条。

名贤隐迹之乡。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东西酒肆会佳宾，南北歌楼烟月市。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

就是在这样的都市里，产生了丰富多采的“瓦舍伎艺”。宋代有一种“瓦舍”，又叫“瓦子”，是当时规模很大的综合游艺场，其中有演出各种戏曲杂伎的戏院，叫做勾栏。例如东京的东南角，有桑家瓦子和中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①。在这些瓦子里表演的有唱小曲，演杂剧，弄傀儡戏，弄影戏，说唱诸宫调等等。说话也是一种重要的伎艺，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的记载，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的讲史，李撚、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的小说，还有毛详、霍伯丑的商谜，吴八儿的合生，张山人的说诨话。说话人里还有以专说一部书著名的，如说《三分》（即《三国志》）的霍四究、讲《五代史》的尹常卖。南宋的杭州也有许多瓦子，城里有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等，城外有二十座瓦子。其中北瓦最大，有十三座勾栏。有两座勾栏是专说史书的，还有一座小张四郎勾栏，是因为小说家小张四郎长期在那里作场（演出）而得名的^②。也有无名的或过路的艺人进不了勾栏，只能在广场上卖艺，叫做“打野呵”，如小说家酒李一郎。关于杭州的说话，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中有一段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

① 《东京梦华录》卷3《东角楼街巷》条。棚又称游棚，就是用棚搭成的戏院。

② 见《西湖老人繁胜录》。

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秦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隐语说谜,又名打谜)。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又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走智(改物类以困猜者),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定其智)①。

上面这段话里提到了好多名目,说了“一者”之后,并没有“二者”、“三者”,所谓四家到底是哪几家呢?就因为《都城纪胜》没有说清楚,所以研究小说史的学者们曾提出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把说公案、说铁骑儿分为两家,有的把说参请也算作一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②我这里根据现有的原始资料并参考各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些意见供探讨。

小说和讲史是说话中最重要的两家,这是不成问题的,首先应当把这一点肯定下来。其次是说经,这是从唐代的俗讲经流传下来的,也应当算作一家。至于说参请和说诨经,恐怕只能附在说经这一家名下,不能独立门户。因为《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的行当里,诨经是合在说经这一家下面的,也没有说参请这一项③。这还可以从《醉翁谈录》甲集卷一的《小说引子》得到旁证。《小说引子》题下原注:“演史、讲经并

①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与此文字大致相同,虽然内容较多,但文字有脱误,更为混乱,不易理解。

② 参看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谈宋人说话的四家》,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77页。

③ 《武林旧事》中有关说话人的家数和名单,见下18页。《梦粱录》里曾举出说参请的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三人,但是连着上面谈经者一起说的。

可通用。”可见这是说话中各有分工而又互相联系的三家。至于第四家是什么，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都城纪胜》这段话里，提到的还有合生和商谜两家。据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似乎并无故事可说。洪迈《夷坚支志》乙集卷六《合生诗词》条说：“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看来合生和现代的相声有些近似，形式比较灵活。《小说引子》的末尾又说：“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这里把合生和演史相提并论，似乎也应当算作说话的一家。但是商谜这一家也未尝不可以列入说话。《武林旧事》里举出的艺人商谜家有十三人，而合生家只有一人，可见商谜比合生更为流行。如果都算作说话家，就不止四家了。所谓说话四家的说法，最早见于《都城纪胜》，后来又为《梦粱录》所沿袭，其他记载宋代瓦舍伎艺的文献资料中都没有见到，可能当时并没有固定的区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话本，主要是小说和讲史两家。对于并无话本可以参证的，只能不加深究，就不必硬凑四家之数了。

宋代的说话是唐代说话的继续发展。最初还是以说经和讲史两家为主。现在见到的敦煌变文中，有些写着宋初的纪年。而且据文献记载，有一个《后土夫人变》（又名《后土词》），自五代以至宋代，一直流传不衰^①。这还是唐代变文的遗响。北宋诗人梅尧臣（1002—1060）《宛陵先生文集》卷五十三有一

^① 见《茅亭客话》卷4《李尊僧》条及《春渚纪闻》卷2《后土词淡慢》条，这是一个讲人神恋爱的故事。

首诗，题目是“吕缙叔云：永嘉僧希用隐居，能谈史汉书讲说，邀余寄之”。这个和尚不但能讲经，而且能谈史汉书讲说，可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说话人。正如唐代的变文，既有佛经故事，又有历史故事。直到北宋，这位希用和尚还保持着这个传统。讲史中最流行的话本是《三国志》，早在唐代就已开始流传，北宋仁宗（1023—1063）时在瓦市中更为群众所熟知^①。苏轼（1036—1101）在《志林》（卷一）中说：

王彭尝云：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顰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所讲《三国志》话本的倾向性是很鲜明的，感染力是很强烈的，也可以说明说话人的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北宋末年东京的讲史艺人中有专说“三分”的霍四究，可能就在桑家瓦子里作场。《水浒全传》第一百十回里描写李逵在桑家瓦听《三国志》平话，写得很真实，虽然《水浒全传》是经过后人增订的小说，但保存着许多由宋元时代传承下来的材料，这一节仍可作为我们了解当时说话实况的参考：

（燕青、李逵）两个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来。来到瓦子前，听的拘栏内锣响。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丛里，听的上面说评话，正说《三国志》。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当时有云长左臂中箭，箭毒入骨，医人华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铜柱，上置铁环，将臂膊穿将过去，用索拴牢，割开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线缝拢，外用敷药贴了，内用长托之剂。不过半月，可以平复如初。因此极难治疗。’关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不用铜柱铁环，只此便割何妨。’随即叫取棋盘，与客弈棋。伸起左臂，命华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对客谈笑自若。”正说到这里，李逵在人丛中高叫道：

^① 参看高承《事物纪原》卷9。